



湖北論壇

時事評論

中國言論自由的等差.....	有年
關於選舉的幾個問題.....	雲坡
「超法律的措施」.....	直之
學生落第，校長撤職.....	真民
論「美援」.....	黎樹德
社會進化的方向.....	曾曉淵
談經濟莫為策論.....	黎少岑
商代之國都問題.....	於務秦

第二卷

11

湖北論壇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中華書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中國言論自由的等差

有年

行政院新聞局十月十五日記者招待會上，記者問：「報載馮玉祥將軍屢次攻擊政府首長，意見如何？奉命出國之官員竟行抨擊政府，中國政府是否可置之不問？」董顯光局長答：「：：馮氏一向對人對事喜作批評，故其最近批評政府領袖之言論，當局并不介意。」這可見當局的雅量 and 民主作風！但馮將軍是些什麼樣的批評，中國通行的報紙竟一字沒有登載，爲什麼呢？批評政府的文字在外國報紙發表，等於家醜外傳，政府既不介意，何以對內反密不透風，絲毫不讓人知道？這其中，還是中國報紙爲顧全政府的體面，自動不予登載呢？還是主管新聞人員禁止登載？無論是一樣，都有背當局的雅量，都違反民主的作風。

前些時，美國特使魏德邁答覆青年譯員以及在政府招待會上和離開中國時所發表的言論，對於中國政府作無情的不留餘地的批評，中國報紙無論是民間報政府報乃至黨報，都一字一句批露出來，並沒有顧慮有妨政府的體面乃至國家的體面。最近，魏德邁在他致援華會柯立芝夫人之函件中，復指摘中國政治領袖爭權奪利，使數百萬無辜男女與兒童牽入漩渦。并且露骨地說：「余同意吾人之援助，必須以應得援助之人爲對象，而切勿爲不法之軍政領袖作僥倖。」這樣難堪的詞句，中國許多報紙又是一字一句批露出來，何以不怕丟政府的體面？馮玉祥將軍的批評，比魏德邁特使「貪污」「顛覆無能」「不法」「作僥倖」一類的話還厲害些嗎？何以中國報紙對於馮玉祥的批評一字不登，對於魏德邁的批評一字不漏？這顯然因爲馮玉祥是中國人，魏德邁是美國人，中國的言論自由權，只許美國人充分享有，中國人要打折扣。顯然美國人在中國具有特殊身分。

馮玉祥批評政府，政府當局可以不介意，假如地位和關係夠不上馮玉祥的人，也同馮玉祥一樣放言高論，批評政府，恐怕政府當局不能不介意吧？這麼說來，同是中國人，在打折扣的言論自由之下，馮玉祥將軍却又具有特殊身分了，不過，細釋董顯光局長的意思，因爲馮將軍素性歡喜批評，所以當局不介意。明白點說：因爲馮將軍有特殊身分，而又有特殊個性，所以能邀特殊優容。更明白點說：這並不是什麼尊重言論自由，夜犬汪汪，秋蟲唧唧，儘他去叫號罷！那末，中國言論自由權的享有，馮玉祥比不上魏德邁，普通中國人又比不上馮玉祥，馮玉祥的言論自由，也不過政府當局儘他去叫號，曲予優容而已！

關於選舉的幾個問題

雲坡

每天拿着報紙看，有兩項消息篇幅佔得最多，情勢顯得最緊張，一是軍事，一是選舉。這一強烈對照，實為歷史未有的奇蹟。烽火愈延愈廣，選期愈來愈近，在彌天烽火之中舉行選舉大典，這說明政府還政於民的決心和迫切。有很多制憲的國大代表一批一批聯名通電，主張選舉延期，等到戡亂軍事結束之後再辦。筆者雖不是國大代表，但相信，這個意思並不是想拖延憲政的實施，正是把憲政看得很神聖，把選舉看得很尊嚴，不願草率從事。孫副主席急於還政，有一次發表談話，罵主張緩辦選舉的是反動。這未免罵得太過火！難道制憲的代表們還不願意趕快行憲嗎？人一開口便罵人反動，這是什麼氣氛？是什麼民主？筆者對於這次選舉有許多致疑之點，骨鯁在喉，吐之為快，自問絕對不是反動。或許仰邀君在憲法分上，給與這點點的言論自由，不加上反動的罪名吧？

第一：記得本年三月下旬，立法院為要符合憲政實施程序，趕於月底公布各種行憲法規；連日開會，星期不休假，甚至於開夜工，拿和飛機比快的精神，幾天便把各種選舉法通過。這樣迅速的程度，在世界立法史上是沒有前例的。當時我們很懷疑，這種急就章的作品，無論立法技術怎樣高明，總有不周密的地方，尤其是不能表示立法審慎予國人以良好的印象。後來，一改再改，乃至無數次的改，到今天還在不斷的修訂，世界上的選舉有這樣的立法嗎？這樣立法的選舉，將來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

第二：選舉日期，是選舉程序中重要的節目，一經公布，便不可更改。因為：公布選日期，辦理選舉人員一定經過詳密的計慮，一更改，就不足以表示選舉大典的尊嚴。又選期公布之後，選民對於投票，候選人對於活動進行，都有他的打算和步驟，一更改，他們便疑心其中有玄虛，不能不影響選舉的嚴正性。今國大代表選舉日期公布了，忽又以手續辦理不及延期一月；監委選舉日期公布了，忽又以與國大代表選舉日期衝突延期舉行。我們縱不懷疑其中弄些什麼玄虛，而手續來不來得及，並不是事先不能顧到的，又不是有什麼新事故發生，國大代表選舉的延期，充分表現辦理選舉人員的辦事輕掉和疏忽。至於監委選期與國大代表選期的衝突，當時何以不注意到？而要到公布之後才發覺更改？這顯然是辦理選舉人員失職，顯然他們的程及不夠。這樣的人主辦選舉，將來又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

第三：由政黨提出候選人，民主國家本有此例。這意義，是各黨集中力量和他黨競爭，最後仍要取決於選民，本沒有什麼不民主。不過在今天的中國，情形便有些不同。可以說，今天中國有力量競選的，只有國民黨黨員。國民黨如額提名，差不多等於指定。而且提名的方式是獨創一格，由縣省到中央，都有行政首長及主管的選舉人員參加主持。試問行政力量滲入選舉，一經提名還有不獲選的嗎？選民簽署的規定，不過是具文罷了。所以演成大家不向選民競選，各向黨的各級指導人員競圈。這是任何民主國家沒有的。因此，青民兩黨便要國民黨保證選出若干人，否則不提名單，并要拆夥。一方面討價，一方面還價，國民黨只要求兩黨名額減小，負責協助在某項名額內獲選是可以辦到的。（見十月二十二日新湖北日報南京專電）既能負責支持兩黨獲選，本黨所支持的人，獲選當然不成問題。因此，國民黨起了內鬨，各地競選的黨員通電反對統制，主張自由競選。這也是世界任何政黨沒有的。將來二黨如何協議，國民黨內部糾紛如何解決，且不要管。這樣的政黨提名的選舉，將來又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

第四：上面說過，烽火是愈延愈廣的。烽火之下，怎樣舉行選舉呢？因此有所謂綏靖區選舉補充條例。這條例的內容，截至屬筆時尙沒有看到，當然無從論列。但不知這個補充條例，在根本大法上有什麼根據？沒有法律根據，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那是什麼樣的選舉？而且，現在大江以北，烽火彌天，綏靖區佔全國幅員幾分之幾？真正不屬綏靖性質的區域又佔幾分之幾？假如綏靖的省分太多，權宜產生的代表比例太大，這樣湊合的國民大會，是不是憲法上的國民大會？

以上提出的幾個問號，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滿意的解答？假如不能，便不能不為憲政前途擔憂。是的！政府還政於民的心情，像火一般的熱烈，不顧一切要如期行憲。只是，在彌天烽火之下，在上述幾個問號沒有得到滿意解答之前，人民只能感謝政府的心，沒法把政權接受到手。不錯！憲政是萬世太平的基礎，人民早願意建立這個基礎。但基礎是要打好的，要打得牢牢固固的。基礎打壞了，上層建築物會倒下來。那麼，上述幾個問號如果得不到滿意解答，便構成一個總問號，就是：這樣的選舉，這樣的行憲，能不能奠定萬世太平？不能，不能結束當前亂局？

「超法律的措施」

直之

最近上海物價狂漲，十月十七日漢口報紙所載的「中央社上海十六日電」中說，淞滬警備司令部爲了鎮壓這次風潮，業已擬定一項「經濟戡亂」辦法，「於十六日下午一時半專差送呈蔣主席批核」。又說，據警備部發言人表示，該項辦法，非常嚴厲，「爲一種超法律的革命性之措施」云。

每次物價狂漲，都是先從上海開始，然後再普遍傳到內地，給予內地人以很大的苦難，我們內地人聽說上海有了取締物價狂漲的辦法，自然要表示關切，但是對於怎樣叫做「超法律的措施」，則因爲到底是住在內地，孤陋寡聞，除了知道那是「經濟戡亂」聲中，「非常嚴厲」的辦法以外，實在還有點不大明白。

在一個名詞之上，加上一個「超」字來表示另外的一種意思，是西洋人慣用的造字方法。有許多字眼，一變成「超」字頭以後，就連西洋人自己也往往弄得解釋紛紜，結果成爲可以代表很多人各不相同的微妙感覺的符號。這情形在中國也竟相同。例如「超法律的」一詞，就只能使人起微妙的感覺，而不能獲得具體確實的解釋。因爲「超法律的」可以解釋爲「脫離法律的」，「在法律以上的」，「不按照普通法律程序的」種種。就常識而論，政府組織及其活動，以基於法律爲明顯的特徵，沒有不要法律的政府，也沒有不假設政府存在的法律，「脫離法律的」，或「在法律以上的」狀態，是一種真空，實爲受過現代知識訓練的頭腦所不能想像。但所謂「超法律的」或者就是「不按照普通法律的」底意思也未可知，姑且就這麼認定吧。

可是，常識又告訴我們，「不按照普通法律程序」也決不是什麼新鮮進步的觀念，甯可以說是情願反動和退化。人類在法律方面的進步，在於把法律的制定，執行和適用，由一個機關包辦分由幾個機關執掌，彼此各有系統，絕不互相侵越；系統與系統連絡之間，表現爲法律程序，因之法律程序便是法律進步的結果。專制時代的皇帝是「不按照普通法律程序」辦事的。從前，皇帝的話就是法律，固不待說，就是皇帝手下的官吏，也可以臨時受命，「便宜行事」。例如御史本是監察官，在職分上不當干涉司法審判，但是唐代的御史可以參與推訊，明代的御史，則已成爲「三法司」之一。又如歷代都把維持治安和偵緝犯罪的責任，交給軍政機關，並且由其自行治理，有名的如漢代的司隸校尉，明代的錦衣衛和東廠等，這都是打破普通法律程序的着例；也因爲如此，所以司隸校尉和錦衣衛以及東廠當差的之流，就仗恃皇帝寵倖，只聽頭目吩咐，而把其他官兒們的

職權不放在眼裏。在現代的政府組織之下，像專制時代這樣法權紊亂的情形，實際上存在與否是別一回事，至少在理論上是不能許可的。就現代政府組織的原理來說，一切政府活動必須遵循法律軌道，脫離法律軌道，就是「非法」，就要發生責任問題。因此，今天沒有人能承認任何與這個簡單原理衝突的措施能夠妥當的成立，也沒有人能同意任何自稱為「超法律的措施」能做合法的措施。而且，認為現存的法律不足以解決問題，而要越過它，抄走捷徑，無異於否認法律的靈效，崇信法外的權力，這也是專制時代給皇帝當差者的心理，非現代人所能理解的。

雖然如此，今日政府官吏，愈是靠沉權力的，愈多有人具有「超法律的」意識，他們口講民主和法治，心裏面却嚮往專制時代「便宜行事」的威風。這種意識常常從條諭手令中浮現出來，又以「實幹」「負責」的褒獎得到培養和鼓勵。這也就是為什麼「超法律的」一詞雖不能予我們以確切的了解，却可以引起我們的微妙感覺的原因。至於現在是否因此存在有專制時代那樣法權紊亂的情形，上文雖說是別一回事，却也不妨順帶答覆一句：有；不但有，而且很多。如最近鄂省府不向中央呈請批准不經議會通過而擅自開征棉花特捐，就是紊亂法權的「超法律的措施」之一。

學生落第，校長撤職！

真民

湖北省立咸寧第一高級中學的校長，爲了他那學校中的學生沒有考得上武大，遭受撤職的處分，這真是咄咄怪事！

首先，我們覺得高中畢業和大學入學試驗是兩回事，一個高中畢業生考不取大學，既不能取消其高中畢業的資格；校長更無屬在十族而連坐之理。

其次，投考的學生，決不會包括那一校畢業生的全部，也不會全體都在考這一個學校；那就決不能因少數投考生之落第而斷定其一般程度之不夠水準。

再則考試既無定準，入學試驗的命題，每多失於高深或偏僻，偶爲其所熟習，即學識稍差，亦獲機遇；如適爲其所不及，則雖滿腹經綸，亦有塞機之時。大學招收額數少，學生投考人數多，取錄之可能性較小，即未能以成敗論英雄。梁漱溟早年考北大未取，十年後竟登北大的講席，爲名教授。落第之學生尙且未可限量，其

師長又非於何有？

提高學生的程度，考核學校辦理的成績，以投考大學之錄取的比率為參考則可，以之為定論，則斷斷乎不可！

且學校教育，主管責有專司；即人事進退，亦有銓選考核的機構，要在平時體察，知其得失之所在；如僅因學生投考失敗一節而加以懲處；則校長既有過錯，主管者之不能見之於課室而聞之於考場，亦難免失察之咎。

各地文化水準不一，各縣中的學生程度，恐怕要較設於省垣者為稍低，因之各地高中所收的學生，也許要較省垣的高中學生，程度要推盤一點；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至少在目前，誰也不能將各地的學生程度，馬上便提到一個同一的水準。慢工出細貨，這是性急不得的事。如果像這樣地操切處置，也許可能教一些校長們觸目驚心，不得不更從提高程度上去積極設法；但如徒只令一些外縣的高中校長，為此不敢於多收學生，豈不是又會增加失學的數額。

無論以應付考試為重心來施教和求學，都不是一個辦法。考試制度之不良，早經主張行使測驗制度的人士，所一一指出，在此不必多贅。現在所要說明的，是一心只注意考試的學習，並不是真的學問；譬如說，記得幾個難題的解法，而昧於公理；記得前七子後七子的姓名，而不知普通的文法；除了應付考試以外，還有何實學，有何用處？

當然在撤這一位校長的動機，係出於對教育事業之一熱情的表現；惜其未細加理智上的考慮耳！據近來消息更正，那一位校長是自行辭職；這個年頭，中國人豈僅自由太多，「自行」亦多矣哉！

編後記

編者

一、本期因為登載了兩篇較長的文章，同時又減少了幾頁篇幅，所以把每期必有的「時論選輯」臨時抽了下來

。以後決定保留「時論選輯」，並且還打算添一欄「時事述評」。

二、今後正文每篇以四千字左右為度，希望本刊撰稿者按這多字數賜稿。

三、我們歡迎縱論時事的通訊文章。

論「美援」

黎樹德

「從美國利益立場」，「必須完成援助海外友人的任務，否則必致目睹各友人走往那些既與本身傳統不符，而又與美國傳統抵觸的方向。」

——七月十四日馬歇爾在美國州長會議演說詞

「英國沒有很多人相信共產黨的說法，認為搞垮英國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是美國（援助）政策的目標，但所有的證據很可以作如此解釋。」

——八月二十三日英國「經濟學人」社論

「美援」是美國金融寡頭集團之政治上的代理者，爲了挽救這一集團所面臨的嚴重危機，而設計的一套策略，意圖從強化當前各國的困難與矛盾入手，用多數的諾言和少數的美元，以略致全世界人民於其所能控制的地位，藉以滋補那瀕於衰頹的資本制度。這一策略，構成美國現行政策的中心。

美國自始即爲一資本主義國家。但因其出生較晚，世界市場已爲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分割殆盡，於是美國資本制度所應以發展的市場，主要地被局限於其國內。這一異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特質，經過此次世界大戰，才發生根本的變化。因爲美國參戰較遲，本土又未曾遭受戰爭的蹂躪，但是同盟國家因作戰需要而產生之龐大的軍需市場，以及因戰爭摧毀生產力而遺留的市場，復賦予美國以「民主國軍火廠」的任務，於是美國之生產力乃得長足的發展。

在戰爭時期，各國市場之迫不得已的讓渡，使美國的國外市場，大爲擴大，和那因而相應提高之「生產社會化」的程度，大體上還能配合得上，生產才得在特殊圓滑的情形之下進行。戰爭結束以後，軍需市場頓形萎縮，而各國之致力於復興，亦足以減削美國的市場，於是美國資本主義行程乃遭遇生產力昂揚與消費市場緊縮的矛盾。這一矛盾，在勝利後一個短時期內，

由於美國人民大眾戰時節餘之購買力的解放，以及「聯總」救濟物資之輸出，得到暫時的緩和，但是由於美國金融寡頭集團在戰時利用種種管制的利便，已使國民財富集中到那佔有全國人口比例甚小之金融寡頭集團的手中，以致大眾購買力之節餘亦爲量甚微，經時不久，即發揮告罄；至於「聯總」所需物資，爲量亦屬有限。於是過剩生產品之累積數與市場購買力之下降速度，背道而馳地與日俱增，使這一集團，深深地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機，從而迫使其政治上的代理者急求一解救之道。

生產過剩與購買力下降之兩極化地發展，本來是資本主義行程中的必然趨勢，此一趨勢的盡頭，就是這個制度的解體。阻遏這一趨勢，大抵不外兩種方式，一個是「以退爲進」的辦法，即節制利潤之徵取，以培養大眾購買力；具體地提出，則如羅斯福總統之新政。另一個是「以鄰爲壑」的辦法，即奪取國外市場；這是一條老路。前者有違乎資本主義的原則，其脫胎化骨之功，必有賴於大有爲之士。至在那已經戰時之超額利潤脹大胃口的金融寡頭視之，當此本身力量尚佔優勢時反而讓步，似屬不智；於是變本加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索性抬高物價，削減工資，以如此雙管齊下之「殺雞取卵」的辦法，來保持其超額利潤。不過，這樣一來，上述兩極化的趨勢

就會愈益迅速；同時，一般地說來，各國皆以發展生產為務，不願使本國僅僅作為他國的市場，因之其所歡迎之輸入，僅限於足以促進生產或眼前無法生產之必需品。再則，就是在各國生產普遍不振的情形之下，也各有其或多或少之與美貨競爭的輸出，此種限制與競爭，皆不利於美國之市場要求。但就在這種限度之內，各國需要自美國輸入者，為量亦頗有可觀，惟是缺乏相當的購買力，無法實行交易，如果美國必須輸出，則惟有「記帳方式」；只是這樣并不能解決當前之「價值實現」的困難，并且要承擔風險，尤其是上述限制之依然存在，使「記帳輸出」的結果，直無異於無條件助長他國與之競爭的能力，當然非美國大亨們之所樂為。不過捨此而外，則惟有坐待危機爆發。此時此際，各個大亨，莫不竭力以圖挽救自身的危機，但是因為種種關係，危機之發展，對於各個金融寡頭之影響並不平衡，因此，從小我利益立場出發之個別地努力，并不足以阻止危機的來臨；甚至於加強其速度。這裏就顯出「公僕」的重要。他們必須設法維護這個集團的一般利益，並用種種超經濟的手段，來達成經濟的目的；諸如個別金融寡頭所無法解決之「價值的實現」，「各國市場的限制」，「各國之競爭性生產的發展」以及「記帳輸出的風險」等問題，都可以通過外交關係去尋求解決之道。具體地說，就是在各國放棄其市場限制的前提下，由美國政府給以貸款，款項由國庫支付，并派遣使節到受貸各國監督其運用。如是，就個別經營輸出業務的金融寡頭而言，其商品價值可得實現；再則，受貸國家既放棄其市場的限制，則以生產力和資金佔絕對優勢的美國，其生產無論在本國進行，抑或移植於受貸國家，在自由競爭的情形之下，皆非後者的生產之所能抗衡。何況更有監督運用貸款之舉，即令受貸國家得能有安定的政治環境，以進行生產建設，亦難獲得競爭之自由。如是美國與他國在事實上就無分畛域，有「共存共榮」之美。這一打算，實在太理想了。不過，「羊毛出在羊身上」，國庫的開支，就是納稅人的開支，固然惟有如此，方可以稍解美國資本制度的危機；但在另一部分只依賴國內市場的大亨們，單就他們的現實利益作衡

事標準，又認為用這樣貸款形式的輸出，實等於增加他們以無償的負擔，不肯支持這一個辦法。目前美國資本制度正處于由主要依靠國內市場轉化為主要依靠國外市場的階段，這一部份大亨們於該集團中佔着很大的比重，在其反對之下，「公僕」就不能任意在國庫中開支。再則，美國終究是一個「民主」國家，這一措施對於人民大眾既有損於現實利益，更不會增加未來的幸福；他們目前雖不能像上述那部份大亨們一樣地，通過議會來阻止「貸款」，但是在行將到來的選舉中，他們却有權拋棄那違背大眾利益的「公僕」。這樣，得不到華爾街大亨們的一致點頭，「公僕」不能舉行大量「貸款」。為了顧及人民大眾的反應，「公僕」又不敢以自己的政治地位來作賭註。因此，這一最理想的，以「貸款」方式的輸出，事實上便不得不打一個大大的折扣。而且就是這樣，他國之願意接受與否，尚屬疑問。

環顧世界各國，除某些小國，因為是近水樓臺，事實上已形成美國的殖民地之外，其他各國，不論其原來為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論其原來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現在都未必肯接受美國之「一相情願」的輸入。社會主義蘇聯固不待論。至於其他各國，經過此次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戰爭，人民大眾於英勇的抵抗中，已日益成長為壯大的力量，他們或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或以其要求生活安定與和平之強烈的願望，迫使已形衰退之原來的控制者，不得不「以退為進」，多少施行一點溫和的社會經濟改革，以或種速度，走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的「自力更生」，表現為民族內部之互助互讓的合作，與民族利益之一致的維護，自然不會為了取得有限的貸款，而削弱其大有發展前途的經濟地位。惟在這轉化的過程中，還有一個難以和協的因素。在人民大眾，愛國的情緒和覺悟性，接受過那法西斯，還存在斯侵略的慘痛教訓，已經普遍的提高，對於外來之勢力，已不能不抱幾分的疑懼。再從經濟本身，聯想到它和政治以至於軍事的因果關係，蓋于那從艱苦奮鬥中所體驗到的真理——民族利益與自身生活之不可分割性，自表現為排斥外力和要求政治改革的熱情；足使資本輸出國引為憂懼。各國

原來的控制者亦因民氣之激昂而感到不安，在不得不「以退為進」的忍讓精神之下，仍藉藉着覓取外援的僥倖心理。不過，如果沒有外力在其中發生積極的影響，則此兩種心理的亦互作用，適為平衡的偶力，恰好推動了國家社會改進的行程。但「從美國利益立場」觀之，似只有利用後者的僥倖心理，用「援助」來加以精神的鼓勵，打破各國內部勢力的平衡狀態，加強其困難與矛盾，兼用實際上的經濟援助與宣傳上的道義譴責，以打擊那些不符合於美國意志的力量；并將其所歡迎之人物，完全控制於掌握之中。只是這一種太現實的打算，又不便赤裸裸地公開，因此，馬歇爾在州長會議上解說「援助計劃」時，就特別說明「在國家的文件」佈告中，必須用外交或至少冠冕堂皇的字句，加以掩蓋」。由是「華援」經常被宣傳為扶危濟傾的善舉。

「援助」的貸款既不可能源源大量支出，則其範圍無力普及，程度不能深入，進度亦未能迅速，勢惟有集中使用；只是集中使用，却又違背其消除各國市場限制之宏遠的意圖。為了「掩蓋」內容的貧乏，遂不得不引用「冠冕堂皇」的形式。

「援助」是一種特殊的「投資」，以避免浪費為其先決條件，如果給予那些不會把市場公開的國家，或不可能獲得特殊的利益的國家，便太不合算。還有些國家，其市場已經屬於美國，又無須多此一舉，當然也不應歸入「援助」之列。對於些遺留下援助的國家，還須要有一個拒絕的理由，於是指摘其妨礙民主自由，以顯示不援助之理由來得正大；並藉以鼓勵其他國家，站在和美國相差懸殊的實力基礎上，與之作「平等互惠」的「自由競爭」。至於對於後者，據謂以俟來年，再作從長計議，一則以誘發對方的希望，好在此其他問題上對美讓步，一則可與立即實施「馬歇爾計劃」的說法成一鮮明的對照，顯示西歐國家之已受特殊的優遇。實則「華援」之運用，正為對付那些行將「走往那些與本身傳統不符，而又與美國傳統抵觸之方向」的國家。

但是這一類的國家亦復不少，若一視同仁，也非能力所及，「援助」的程度，必有等差，速度須分緩急，態度亦求冠冕，因此，在「援助」之實施

，復具次述四種型式：

第一種型式是程度普及，速度急迫而態度不明。這一型式的對象，是已被美國完全控制的前敵國（例如日本）。本來，這些國家在勝利之利，因為那主持侵略的統治集團的力量，已大形削弱，人民力量，相對地蓬勃滋長，但經美國在各該國家之佔領者的微妙運用，處處壓抑後者，並將前者置放於其控制之下積極地加以扶持。這樣構成恰如理想的「援助」條件隨時予以大量援助，使之在經濟上，政治上以至於軍事上，都迅速地恢復舊觀，進可以作為向其他國家擴張的基地，退可以成爲一無何障礙的美國市場。不過，像如此之厚於敵國而薄於友邦，未免減低美國之國際信譽，所以在態度上不願明白的表示，或以減輕佔領費的負擔為藉口，或只是不聲不響地私相授受。

第二種型式是程度集中，速度適時而態度鮮明。這一型式的對象，由於其原來的統治集團，在反法西斯的戰爭中，逃亡在外，而被其遺棄的人民，則在民族自衛抗爭中已鍛鍊成堅強的力量；敵人投降之後，原來的統治者又藉外力來攫取勝利的果實，於是在「以暴易暴」的刺激之下，加深了人民的怨怒，使那在本國已失去存在基礎的復辟者，愈益依靠外力，寧願無條件地甘作附庸。「從美國利益立場」觀之，這一型式的援助對象，恰好合於條件；所不能滿意的就是那統治權之不鞏固，惟有集中「援助」於軍事方面，適應需要，以爭取時間。在態度上，則以鮮明的旗幟為標榜，用資「粉飾」。例如希臘，在勝利之初，人民憑藉本身在戰爭中所成長的力量，已經建立民主政府，可是不久就被英國以壓倒的武力，護持流亡政府復辟，致使其內部分裂。其後又以力不從心，把這份產業讓給美國，那復辟的政府就投在美國懷抱內，歡迎監督的「援助」，美國貸款也就大搖大擺地貸與。

第三種型式是着重一點，相機而出，在態度上則是有收有放。屬於這一型式的國家，其現政府尚未被美國完全控制，而人民對於「華援」的反作用又特別強烈。所以「援助」的條件不能不特別苛刻。偶爾針對其政治上之弱點，略予貸放，隨即坐視反應，一任那政府遭受人民之反擊，迫使其不得不

出重大的代價以繼續求取外援。例如法國，在此次大戰後本已成立過一舉國一致的政府，本年四、五月之間，「美國官方人士曾宣稱，美國準備加緊援助破碎的法國經濟，惟以拉瑪諾總理團結共產主義新政府為條件」(五月五日合衆電)於是代表法國資產階級利益的拉瑪諾等就適應這一條件而改組政府，政策亦隨之而轉變，果於五月七日宣佈可獲貸款二億五千萬。結果導生了政治上的分裂，以至剛好恢復的生產力，便遭過一連串具有經濟與政治雙重性的罷工，生產頓呈萎縮，似使美國所企求的，削弱其競爭性之生產的意圖，已獲初步的成功。不過法國現政府所代表的經濟集團，尚有某種程度的力量 and 信心，同時也以過於刺激人民引起更大的反作用為慮。美國估計到他尚不易無條件地投入自己的懷抱，就指定這一筆貸款必須購買美國軍需剩餘物資，而且估價特高。甚至如法國 Liberation 報所透露，美國經濟援助法國的交換條件包括(一)美國要求投資於法國外屬地，如南非和南非；(二)美國要求法國締結協定，讓美國商業飛機可以在非洲降落。此外，并脅迫其各忍那對於自身威脅最大的德國馬上復興，更惟恐法國政府不甘於履行這些足以致命的條件，便要它起用戰前的政治家——亦即在國內最無能力因之對外也最慷慨的慕里黑主義者——參加政府，否則不再「貸款」。或則予那更易於接受條件者以「援助」，形成取而代之的形勢。總之，盡量地逼使其在國內陷入孤立的和受攻擊的地位，叫它不得不俯首聽命於華爾街。但是當這一政府真正到了搖搖欲墜的時候，却又給一點救急性的「援助」，用以維其殘局，并堅定其走往與「美國傳統」不相抵觸之方向的決心。

第四種型式是「吊桶養馬」甚至「畫餅充飢」，但在態度上則表現得特別熱心。這一型式的對象就是大不列顛，它是資本主義國家中，除了美國以外，比較最堅強的堡壘，戰爭中受創甚巨，人民因而覺醒，窮則思變，所以在大選中，擁出比較開明的工黨上台，這個政黨在不違反資產階級之基本利益的前提下，施行了若干以退為進的改良辦法，從緩和內部的分化中

提高了戰後生產，形成和美國競爭市場之趨勢。但因其「復興」行程中需求若干對於生產有重大影響的物資，期望美國加以援助，因而予後者之以可乘之機，一方面極力宣稱可給予英國以所必需的援助，一方面則必以其放棄那妨礙外資競爭的國有政策和排斥外貨的帝國特惠制，以及割讓魯爾管轄權，并責成它繼續承擔那在事實上是為美國看守市場的海外駐軍的重負等條件，而實際援助則新而不與，或與而不足，坐視其疲憊，以便一舉而擊潰之。所以，甚至保守如英國「經濟學人」，也沉痛地說：「應該警告美國，在這裏，由於美國一連串難堪的行動和要求，人們已經感到被美國逼到絕境，英國沒有很多人相信共產黨的法說，認為搞垮英國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是美國政策的目的，但所有的證據都可以作如此解釋，假如每一次美國的援助附上那麼多不能忍受的條件，使英國不可避免又再一次向美國要求援助，而第二次援助所附的條件，則又比第一次更叫英國難堪，如此循環不已，這種政策的後果，除搞垮英國，不會是其他。」(八月二十三日該刊社論)

此種政策之結束：對於援助之所不及的兩類國家而言，那已「走往與美國傳統抵觸之方向」者雖未獲「援助」，其經濟之發展并無因而而遲緩的徵象；而對於那刻難走往這一方向者，似僅使之對於美國發生反感。

至在「援助」範圍內：

第一種型式的「援助」，似乎收效較著，但也僅限于日本，其經濟已有畸形之發展，就現實利益說，對美國確有補益。不過，侵略戰爭甫告結束，和約尚未成立，血的教訓猶是新鮮的回憶，這種「援助」徒使全世界人民將它和「侵略」的概念發生聯想，無形中使他們改變對於美國的印象和反應，例如澳洲官員即曾指責美國的這一政策是「乘人之危」。至馬歇爾援助計劃之以復興德國為中心，亦為西歐國家之所未能完全同意。

第二種型式的「援助」，它的對象如希臘，據四月二十六日報公報紐約通訊，謂「其現政府是在保守的一派掌握中，官商不分，貪污遍地，軍事上借用外力，屠殺人民，保留僞軍，進攻當時的抗德份子，……而美國所謂救

濟，是以軍事力支持這一腐臭的勢力」。因此，如美國之「世界報導」雜誌所稱：「許多有地位的希臘政治人物，本來站在雅典政府方面的，已經走向游擊隊方面去了，因為他們相信這個政治鬥爭的最後勝利者，將是共產黨」。逼使反共的人趨於附共，僅僅落得雅典政府將祖國變為美國之外府的支票，事實上又不能兌現，就是這一型式「美援」的收效。

第三種型式的「援助」，其接受者雖不若第二型式的接受者之腐臭到失盡人心，但也正因為如此，美國惟恐其利用「援助」而加強「復興」，成為市場競爭的勁敵，所以未肯放心地「援助」，而那涓滴的「貸款」，配合着苛刻的條件，所得到的結果，僅僅是使這類國家的人民發生強烈的反作用並予反對黨以擴大的政治影響的機會。

第四種型式的「援助」，即對於英國的「援助」，雖然在魯爾管制方面略有收效，但逼使其撤退海外駐軍，却等於削弱為美國保護市場的聲勢。此外，如果說另有成就的話，那就是使英國政府發生「自力更生」的覺悟，以及從官吏到人民，從左派到右派之一致地對「美援」報以口誅和單伐。

總括地說，「美援」已經召致了適與願違的結果。不過，這樣的結果，基本上是發源於那一政策本身所具的矛盾性。如馬歇爾之所指陳，「美援」的意義在導使各國「走向」美國所願「目睹」的方向，這一方向由兩個要求構成，一個是使各國不走向「違背本身傳統」的道路，具體地說，就是使那些原來為資本主義的，為殖民地的，或為半殖民地的國家，不變成非資本主義的，非殖民地的，或非半殖民地的國家；為着這個要求，就必須極力強化各該國之支持「傳統」的力量。但是無條件地強化它們，必然助長各該國之資本主義的競爭性，又和第二個要求相反，即促使各該國增加了與美國資本制度之發達相抵觸的力量。因此，這一政策在實施上就不得不變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是迫使那些需求「援助」者將一切足以保護市場的限制完全撤銷，降居於美國之附庸的地位；如果對方能痛快的一次交割，則援助立予兌現，日本和希臘就是這樣。要是對方不肯輕易脫手，則不惜生意經似

地一再拖延「援助」的支付，即令支付，也是「雷聲大而雨點小」。雷聲大則可加強刺激各該國的人民，使之對政府發生反感，「雨點小」則使對方無力制服人民，不得不再讓步以求取「援助」。在這種討價還價的過程中，不管各國人民力量如何地增長，只要不臨到形成東歐國家那種形勢，「援助」者總是存着隔岸觀火的態度，一直坐待理想的「援助」條件形成後，才步入第二階段，給以大量的「援助」，并監督其使用於掃除足以阻礙美國市場擴張的人民力量，以及從事於由美資控制和不與美國生產抵觸的「建設」。

不過，除了日本和希臘等少數國家外，其他各國的本身力量決定了第一階段之長期性，而它又是「美援」不能大量支出的階段，因此，這一形勢就規定了美國在相當長的時期之內，不能使「貸款」成為主要的輸出方式；但捨此之外既無其他方式可以發展輸出，因此對於那以賴增加輸出始可緩和的經濟危機，除了期望其延期到來之外，別無善策。

但是，那些不肯就範的求援者，又正看中了這一點，一則極端避免和美國發生太密切的聯系，以防召致危機的影響，一則「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儘量減少美貨的輸入，加強其危機的威脅，以迫使美國讓步，這樣一來，「援助」之第一階段就更更延長，而美國的危機也愈益擴大。事實證明：「國外對美停止進口一經初步施行之後，六月美出口較五月減低百分之十三，七月減低百分之十七以上，馬上股票交易所就出問題，八月一整月股票下降，低落到自去年秋間股票下降以後沒有的深度」。十月十四日大公报美國通訊）

作為解救資本制度之危機的美援政策，它在這危機中產生，隨這危機之發展而發展，又將隨這危機之爆發而結束，時間是最無情的，往往不願應人們的主觀願望，把一些充滿着理想的計劃，方案，主義，策略等等變成歷史上的諷刺名詞。

美國在抵抗法西斯侵略戰爭中和我國比肩作戰，給予我國許多友誼的協

助：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所衷心感謝的；戰後我國亟須完成建設工作，在物資上也需待友邦的援助，不過正如十月十七日武漢日報社論於批評「蒲立德先生竟把戰敗日本與戰勝中國等量齊觀」的援華建議之後，所指陳的：「除了善意的援助我們表示歡迎外，一切以「權益」性為中心的援助，決不為中國人民之所歡迎」。這不僅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呼聲，也是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呼聲，如果美國真照蒲立德的建議，予我以「援助」，如大公報十月十三日

社會進化的方向

社會進化的方向，本文茲舉出其主要者四端，為分別簡述於次：

一、由少數主義到最大多數主義

自土地私有的事實漸漸發生後，古代原始共產社會便或急或徐地解體。這以後，權力和財富便漸次集中到少數人手裏去。首先是權力，在原始共產社會後期，酋長，部落長，家長們由於對外爭攘，對內管理的需要，他們漸有了若干統治權力。不過這時，共同勞動的產物即財富，仍為大家所共有。這樣的社會的最後的解體，遂有了君上專制主以及其臣屬，諸侯，貴族，封建主，武士，和直接指揮經營土地的地主，另外有教主僧侶代表神權與王權相結合。隨着權力之後，財富也為這些少數人所有；沒有財富和權力的，是奴隸，農奴，黎民等最大多數人。這樣的時期很長，或數百年，或數千年不等，現今世界上尚存在有此類社會形態的民族或地方。

生產工具的繼續改進，社會生產力的更高度的發展，表明此專制封建社會及其基礎上的少數主義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已經告一結束。由市民，工場作坊主，小商人等出身的近代的工商業者，即歷史上所謂第三階級興起了，權力和財富又移轉到他們手中去了。這是人類社會進化歷程上，由少數主義到多數主義的方向的一大躍進。隨着第三階級的興起而興起的第四階級的勞動大眾，更是大多數。工商業資本主義不獨教育了，訓練了，發展了廣大

社評之所推斷，「則「反蘇助俄」的大戲很有上場的可能」。不過「從美國利益立場」，以導演的資格，把友邦和前敵國納入一個範疇內，予以「權益」性為中心的「援助」，實屬不智，緬懷過去的友誼，展望未來的發展，吾人深望美國友人，再不要為了玩弄外交手腕，至令未來可助長友誼的美援，反而成了一個製造糾紛和惡感的源泉。

曾曉淵

的勞動者羣，使後者有覺悟，有組織，有團結，有管理產業等的能力和技術；而且也直接間接地使一切落後的未開化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有了覺悟，有了教育，有了團結和組織，有了近代生產，產業和交通等一切文明的設備以及管理才能。此外，婦女們也由之從廚房裏家庭裏走到工廠裏和事務機關裏去了，即是婦女們也被教育，被勞動需要，有了獨立的人格和地位。所有勞動者，婦女及落後國家的人民，他們都覺醒和興起了，他們是以絕大多數和極少數資產階級相對峙，而為其自身利益奮鬥。從少數到多數，到最大多數，正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的方向和明顯的事實。現在，由最大多數主義到無貧富，無階級的時代，這亦已是大家更前進一步的燈塔。

現在正是最大多數主義同各種少數主義鬥爭的時期。這一鬥爭，是最艱苦的，是最繁重而且比較長期的。資本主義擊潰封建主義社會體制已經是艱巨非常了，有好多先驅者上了火刑台，或被釘在十字架上，法國大革命前後有百年之久，經過了多少可怖可怕可歌可泣的事。而資本主義社會到有其更高的文化，組織，軍事工業，它的倒斃，當然是更其不易。但是，當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盡了其應有的在歷史上的積極的（即有益的）作用之後，它的存在已是歷史的渣滓，它已鋪好了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它就不可能障礙着衆人的前進，勞動者，弱小民族等已經分有了少數資本主義者所有的文化，科

學，軍事，武器，組織，技術，等的武器，最後的勝負，是爲社會進化律所規定了的。

現在的新民主主義與此處所謂之最大多數主義二者爲不可分。民主主義是最大多數主義的現階段鬥爭的目標，也是動員最大多數人的方法，使最大多數人能充分有力地起來爭取最大多數的完滿實現。也因之，凡是代表多數人的利益的統治者必然憎惡民主主義，必不得已時，則以僞民主的招牌因應之；反之，則恰爲最大多數主義者所熱烈擁護，忠誠奉行。

二、由自存自助到共存互助

——亦可以說是由個人主義到羣衆主義或團體主義——

初民社會本是共存互助的。當原始共產社會的遊牧時期和漁獵時期，是必須由共存互助以達到個體的生存的。自土地私有制漸次建立後，人依附於土地，得到比較固定的安居，以前依存於部落的，現在縮小到依存於一個家庭。個人可以從事耕種，不像漁獵須集體爲力，必要時全家共同耕種，也就可以了。其他的社會生活，則除家人外，頂多亦僅是鄰里之間，守望相助。大家各自耕田而食，擊井而飲，雞犬相聞，但老死不相往來，以致所謂十里不同風，五里不同俗。要之，農業社會的共存互助的範圍是極小的，個人是主體。個人上面有一個家，次之是宗族鄰里鄉黨。一個宗法系統就是維持大家的生存了。至於所謂國，所謂天下，不過是些空洞的概念。所以修身齊家和個人的修養爲最所注意，至於兼善天下以及治國平天下，那都是極少數的「達」者，聖人和帝王的事。

個人主義英雄主義家族主義和宗法主義數者意義相通，皆是農業經濟社會下面必然的產物。迨工商業發達，資本主義體制興起了，羣的觀念和團體的觀念才由於事實的發展和需要而漸就明確。在工商業資本主義時代，交通發達，貿遷有無的範圍擴大到全國以及國外，即地方經濟擴大爲國民經濟，爲國際經濟，這時雖是個人的活動亦往往有其全國性，與全國各地甚至與鄰國相聯繫。國家民族云云，至此始有其更明確的實踐的意義。國家統一了，

國家對內有嚴密的結合的機構，不再是農業社會時的那樣的散漫鬆懈，對外尤其是此疆彼界，壁壘森然，動輒有國際戰爭。凡這一切，都是要求個人不得不擴大其活動的範圍。在生產機構上，更到了非分工合作不可的時候，分工是分得非常之細，任何一簡單器物，都非一個人所能製成，一人只能担任一種成品的一個極小部位。分工愈細，則工人彼此相需愈大，即合作愈密切。從前的家庭宗族親屬關係，至此反顯得不如在工廠內同不相識的其他工人相互依賴之深。而當工廠主，資本家壓迫工人時，向之骨肉親族鄰里對此還有什麼幫助呢？只有工人相互間集體奮鬥，共同反抗，始有力量。這樣加強了工人的團體意識。

在農業經濟社會，限於當時物質條件，除鄉里宗族相依存之外，不可能有更大範圍的聯繫，所以個體觀念發達，團體意識薄弱。當時統治者及其文教代表人——聖人之徒們，其眼中也僅是無數的一個一個的人，他們注重個人改善，由改善個體以改善共體。到了工商業國民經濟社會廣大範圍的相互依存關係既係新的物質條件下的必然之毒，則共體共相的觀念自然加強了。要改善個體，就要從共體致力，所以羣的道德，團體生活，環境改造等等，特爲所注意。這不是輕蔑個體；乃是因爲個體受共體的影響太大，不得不從改善共體着手以改善個體。

個體受共體的影響太大，太密切了，在廣大的國家民族的範圍內以及其嚴緊的政治經濟機構下，個人不過是千萬份子中一份子。在細微的生產的社會分工技術分工的條件下，個人不過是應機器，爲一種小部門的零件的製作而已，若無其他工人爲另外各部門的製作，雖是一針之微小，也製作不出來。個人真是很渺小的，個人英雄觀念殆無從發生。家庭觀念，宗法關係，在這時都被工商業社會破壞了，一家骨肉，不分男女大小，都爲了生活，必需分散到各工廠裏去工作，他們惟有隨從其各該工廠內的工友全體爲階級的集體行動，家人同利害，相親愛之觀念已漸薄弱了，家人相助之事已屬極少效力了。

在人類社會進化歷程上，舊的自存自助的時代，或家屬共存互助的時代，以及在此下面的個人主義，現在不得不為更大範圍的全國性的互助共存的時代所代替了。而且，現在又正由全國性的合作向全世界性的團結合作發展。這種國際主義的物質條件，已經由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國際規模為先行預備成熟了。

現在正是這個時期。即優秀的人士正在為世界規模的團結時期。尤其是全世界的工人和全世界任何角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既然同在帝國主義的極度剝削壓軋之下，大家運命都是相同的，所以大家必需，必然，且已然為全世界規模的結合，以共同奮鬥，以求生存，並以推翻帝國主義制度而建立新的更合理的世界和平秩序。現在正是為世界大同，天下一家而致力的時期，因為人類社會進化的指針，現在剛剛指在這兒！

三、由私有制到公有制

所謂原始共產社會，它並不是原始人類有計劃有意識地做成的；今人視之，也不發生倫理上善與惡，感情上愛與憎的問題；它是在那一時期物質條件下的自然漸次形成的，後來社會史學家把那一期的人類生活方式，姑且為起了這個名稱。由於生產工具的若干進步，生產力的一步發展，一個人的勞動成果，有了食用不完的若干剩餘，這便發生了最初積蓄的可能。這是非常重要的新事實，由於這一事實，使那時部落酋長們開始可能佔有別人勞動成果，稍緩，那一般的部落成員也懂得如何積蓄其食物到明天。這裏開始有了剩餘，有了私有傾向，有了創造文化的餘裕。人類社會史上的私有財產制大約就這樣有其物質基礎了。由此，私有制逐漸代替了原始共產制，在人類社會史上展開了一新的階段，這一階段迄今猶存在於占全世界六分之五的面積。

正如不能否認歷史上其他任何制度的作用一樣，人們不能否認私有制在人類社會史上的積極作用，並且人們應該承認私有制的歷史上積極作用比其前者乃是無比的巨大。私有制的歷史上的積極作用舉其要者言之，是提高了

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并由之建立了其上層意識的空前完美的結構，假定人類史上自昔無此私有制，將是不可想像的事，也可以說，這種假定的本身即為不可能的事。為什麼私有制提高了并發展了社會生產力？人們的勞動成果被少數寄生階級不勞而獲的部落長，地主，帝王們強占去了，自己今天或明天即不得食用，自己便惟有設法保持自己的剩餘勞動，并加強自己的勞動以求從自己經營上（最初是土地耕種）可以多有收穫，從而多有積蓄，這樣便有了提高并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主觀方面的條件。勞動是疲憊而苦的事，有可能不勞動的人，是相習為好逸惡勞的。此不勞動的少數人的自然發生的私有意識與強占他人的剩餘勞動品的行為，一面既促成了他們的私有觀念，一面也促進他人不得不加緊努力生產，結果，是一般的私有心理養成了，社會勞動生產力也發展了。有人說，人皆有私有天性，人皆有占有衝動，他們主觀人底私心是提高并發展生產力的動力，因之，他們擁護私有制度，而以為在公有制下，生產力將要衰歇，因為人不能占有自己底生產成品，誰還肯努力生產呢？但是，如上所說，我以為私有觀念的最初發生及生產力的推進，乃是由於有了好逸惡勞的剝削階級及剝削事實發生之故，與他們底說法有所不同。而剝削事實的出現，又是由於有了積蓄的可能之故。顯然，私有心也并非天生的，并非永久不能消除的。我們現在有作自己的打算。將來在非私有制社會之下，私有意識不然而要淡化以至於根本上即不可能發生，甚至將不懂「你底」「我底」為何意義。然而生產力在生產品共同享受及優良勞動條件等情形之下，則勢必更為提高和發展的。

資本主義在私有財產制度的基礎上，將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了空前無比的程度，私有制的本身亦在歷史上發揮了其應有的充分的積極作用，到了登峯造極的地位。但是，也因此，私有制的發揮到了飽和點，到了極限，早將在歷史上發揮着負的作用。即是它，私有制，早就在阻礙着生產力的發展；在社會分配上，更是空前的不平衡，億萬的人勞動勤苦而不得不餓斃，反之極少數資本帝王貴族們則強占別人所有盡量揮霍淫樂，甚至將勞動成品浪費地

大批地拋到海洋裏去，或讓其腐爛於倉庫裏。而且他們還不得不製造戰爭，以重編大衆。今天，私有的本身及建在其上面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制無不早已在腐爛生蛆了，它早已在障礙着社會進步了。

私有制及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制，其在歷史上最大貢獻便是爲公有制奠定了基礎，鋪好了橋樑，使公有制的發生和實現，成爲可能。我們知道，科學的公有制社會主義并非人們願腦裏面所能憑空地隨着主觀的願望即可構成的，它在農業經濟條件下即不可能，它必需有其一定的客觀的物資條件，才是可能的。現在，這世界上的一切，都被少數資產階級條理起來了，組織起來了，少數資產階級提綱挈領地集中掌握着管理着全世界，他們以各種僞說，愚弄地籠罩着全世界，而無數衆人則在其籠罩下，統治下。現在事情很簡單，直須衆人起來將此種少數推翻，則世界便在衆人統治下，如此，歷史的發展即變了質，即私有變成公有。而這一改變的條件是已經具有的，第一，是在私有制下，飢餓的衆人，被創造成爲最大多數了；第二，衆人已受教育了，被組織了，有覺悟，有力量了；第三，工廠的管理及政治的管理，他們已有了經驗，而工廠本來早就全在其掌握中，只須換他們來管理。

所謂事情很簡單，是就改變的可能性和人數力量對比等等而言，然在改變的過程上，當然是空前艱鉅的。很明顯的，中小資產者羣，智識份子等還自以爲與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同利害，而支援它，軍隊還在其愚弄下面受其指揮，從而現今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等都仍然在其掌握中爲反動的武器。現在全世界正面臨着這一嚴重鬥爭階段，不管任何人願意不願意都已參加到其中了。不過，人們相信：由私有到公有，是人類社會進化的方向所在，要非人力所能挽回。

四、從低級享受到高級享受

無論文化上，福利享受上，人類社會進化規律，總是由低級的走向高級的，走向更高級的。

嘗見人喜說，古已有之的這些話，彷彿古昔是盡善盡美的。一般的知人

論世，總以爲今不如古，今人不如古人。對於死者，只要不是所謂大逆不道，大抵加以原諒，若果是所謂好的一方面的人，則更神化起來，加以崇拜。唐虞何世，迄今令人稱盛，令人嚮往不置。凡此情形，以及爲什麼在東方人特爲顯著，還有兩個原因：一是由於變亂既久，人們不滿意現實，就容易回首過去，以爲過去的是好些，以致有迷戀骸骨的表現；另外的一個原因，則是崇拜過去的心理，本是農業經濟與專制主義社會下的產物。原來專制帝王必託於神授，或託於其文武神聖的先祖先帝所傳，他以這來統攝人心，加強人們對他的向心力。所以在專制時代，祀天祭陵，是其大典。不但以自已列祖列宗爲神聖，而也以其他過去的帝王爲神聖，因爲這樣，他將來也可被其他帝王神聖視之。在政治上，人治爲中心，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所以聖君賢相，在古舊政治上也實在重要，值得後人崇拜。就產業上保守觀點言之，無論手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全靠經驗，而經驗與技術則爲先輩，爲父師所特有，須經口講以授幼小，祖宗，父，師，在人們看來，當然是尊嚴神聖不可侵犯的，因爲他們掌有生產業的經驗與技術。畏天命，法祖宗，後一輩的不如前一輩的，今人不如古人，世道不古爲可惜，今人喜談改變爲可怕，這一切，在如此社會中，都是毫不奇怪的事。東方各國經歷農業經濟專制時期更久，所以也特別具有上述守舊尊古的傾向。

今不如古的觀念是農業經濟專制主義下的產物，與人類社會進化的事實全不相合。當工商業資本主義制興起時，它就不是這種觀念，這和它創造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要求不相容，而且正是它的障礙物。資本主義要按照其自身的要求，從新創造世界，改變一切，正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們懷疑過去一切，要重新估定價值，要把一切都放進實驗室去實驗一下，他們是無神論者，是唯物論者，他們信任自己，不信任古人，信任證據，不信任傳說。不過這就資本主義在鼎盛期而言；至於當資本主義本身也到了成爲歷史發展的長途上的絆脚石之時，資本主義也就和封建專制主義者們採取了一致的反科學，反進化等類的今不如古的觀念了。但資本主

繼在其初期所鼓吹的進化論，是有其光輝的價值的。

縱觀人類社會從古到今的發展，其無時不在進步之中，是不待說的鐵的事實。農業社會的進化比工商業社會進化得為遲緩，若指說是等的顯著的進化，則前者可以百年為單位來看，後者甚至可以十年為單位來看。今世的文物制度飲食起居，若與遠古相比，簡直難以言說，若以之一世紀前，甚至若以之與十年前相比，亦判然有別。即愈是近頃の製作，愈適於人的享受。

古代的億萬衆人（包括聖賢相在內）對於人類，在精神上物質上各方面曾經提供了其偉大的努力和成績，使其以下各代在其成績的基礎上，又提供了努力和成績，以至於人類社會又進一步。正如古代衆人在古代衆人的成績的基礎上得到成績，促進社會進步一樣。人們不能輕視古人聖賢及無數無名氏的豐功偉業，但是人們不能因而就說古人已到達了文明極限，而遂以為今不如古。現在我們幸而有了比古人所夢想不到的高級的，非常高級的精神和物質的豐富合理的享受，我們一面要感謝古人和今人底無限的努力；一面也更要知道：現有的文化文明水準雖遠比古人為高，但更有發展與創造的無限的遠大前途，須待我們努力；而且這現有的精神和物質的文明成果，尚有最大部份是被極少數人把持在手裏，這更是不合理的現象！人類社會的進化方向之一，是在精神方面物質方面走向高級的，更高級的，最高級的享受，這不但是事實，而也是人類生存底意義和希望之所在。否則，人底生存，還有什麼意義，什麼希望呢？

以上簡述了人類社會進化的主要方向四端，即：一、從少數主義到最大多數主義；二、從個人主義到羣衆主義；三、從私有財產制到公有財產制；四、從低級享受到最高級享受。尚有與此相關二三事，併為略論於次：

一、上述四個主要進化方向，可分為如次兩個系列：

少數主義
個人主義
私有產制
低級享受
歷史上積極作用已完，正在殞落

最大多數主義
羣衆主義
公有產制
最高享受
現在正在爭取，以後定要實現的

此二系列之相互間為縱的聯繫，各系列內四端為橫的聯繫。所謂橫的聯繫，就前一系列說，少數主義必然與個人主義家族主義相通，可謂即為一物。又一定都必然是私有財產制度下的產物，與私有不可分離。這種社會下的精神的和物質的享受上，毫無可疑，又一定是比較低級的。這四者互相附屬，有其一者，必有其他三者，萬無單獨存在之理。反之，後一系列的內部四端亦密切結合，有似物以類聚。最大多數主義與民主政治，羣衆主義，團體主義，在意義上正是息息相通的。是等的發展必然是反私有制，爭取公有制。且亦惟有在公有制實現之過程中及其以後，是等才可更充分發展。而在這一切相當成功之中和之後，一般人的最高級的精神物質的享受才有可能。倘若私有制未能解體，一般人即最大多數人的最高享受，恐怕不獨不會有，而且還在飢餓與被殺戮的危險中。再以最高享受一點言之，倘若離開了最大多數主義，則不過是資產豪門的享受，這用不着別人說教了。必須最高享受和最大多數主義相結合，才有進步上的積極意義。由此，可知人們的努力，必須是全面的，若只在其中的任何一二點上從事，而忽略了其餘，則不獨是不澈底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至於由前一系列向後一系列的進化和發展，以及其相互間的縱的聯繫，前已說明，這裏不再說了。

二、所謂真理，在社會科學上，廣義的說來，應該就是指社會進化而言。上面所說的社會進化的四個主要方向，也就是吾人政治生活上社會生活上所應把握的實踐的真理。在政治上所謂反動，不外乎係指違反進化的方向而行動之意。把社會進化的長途列車向後扭轉，這不是反動，是什麼呢？

三、但當社會制度開革之交，尤其是現在這反私有制的歷史上最大最後一次的變改，真理與反動二者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定是空前的激瀾。

。所謂空前的激烈，是說它比資本主義當日革命時，即摧毀封建社會時，更為類巨的意思。比着現在對於資本主義的革命，資本主義之反封建主義，實是量的問題，因為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尚同是私有制下面的體制，它二者中間並不發生質的變動，而現在則是質的變動了。這是極其艱難險阻的一較長的過程，將不免有意想不到的波折與險惡。

四、然而現在則正是這樣的時會。正是社會進化歷程上一最嚴重時會。在社會進化的艱苦歷程上，以及當此嚴重階段，人們往往易於輕視自己努力

的價值以及中途疲弱下來，不繼續努力。人的努力的作用是什麼？在進化的長途上，人們參加其主觀的努力，其作用是相當巨大的，它僅生助產，減少在過程中的犧牲和痛苦以及浪費，並導引進化走入正確的，即最合於人類生存發展的方向。不要看自己的力量太微小，你周圍有最大多數人類在與你共思難。不要中途軟弱下去，你的軟弱多少是社會進化過程中的損失。願應社會進化方向，勇敢而堅強地為真理而努力，這是人的莊嚴的責任。人在客觀發展的可能條件之下，決定一切！

談經濟莫寫策論

一、春秋責備賢者

前些日子看到李燭塵先生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又談到了所謂充分就業的問題，認為言論界之有如是的說法，無異於促使當局放棄工資的政策，適以制工業界的死命。

本來，言論自由，各人儘可有各人的看法，不能強人之所同；也不能因當局之有所更張，而見怪於時論之先有與此相關的建議。然而，肉食者鄙，當局者迷，春秋責備賢者，這幾年來讀到各種各色的經濟論文，筆者早便與李先生具有同感。

就從充分就業這一個說法談起，現在已經是第二次出現了。兩年前筆者在經濟復興與充分就業一文中，即曾指出「充分就業」這一個名詞，在兩三年前，曾為我國輿論界之所樂道。那時候

，後方的一些工業，都呈現着近於飽和的狀態；人力物力的來源，開始感覺枯竭；出品的銷路，也趨於停滯，於是有一部份人認為這已臨到了「充分就業」的邊緣，一切不急要的建設，應該馬上停止。其實生產事業沒有配合得很好，是一個問題；不急切的建設應該停止，又是另一個問題；在人事浮濫，游資充斥，和物質異常缺乏的情形之下，看到了一些表面的，與實際正相矛盾的現象，認為這就是充分就業，則未免有似於張冠李戴。

記得在三十二年間，由某大報發出了充分就業這一緊急信號，適值國庫告乏，結果便招來了工資的緊縮；隨後要不是納爾遜來我國組設戰時生產局，大後方的工業，早經不起那一打擊，等不到勝利來的時候，便要關門大吉。這一經過情形，李先生在那篇文章中曾有着身歷其境的

生動敘述。也就在這個當兒，同樣從那一家報上提出了法幣回籠的呼號，黃金政策和抽緊銀根以緊縮信用的辦法被實施了；其後效若何，到今日差不多已成定論，用不着一一重述。即如黃金政策，雖已改變，而當初所拋出的大量黃金，竟成爲在市場上掀波助浪，蕩弄物價的禍水，有能放不能收之苦。

抗戰勝利以來，第一件鬧烘烘的策論，便是改幣匯率，有不少的作者，根據他所依據的理論，會算出了一個比以後新訂的匯率還要低一兩倍的匯率。在筆者所會看到的一些論文中間，似只有作者爲新湖北日報所寫的那一篇專論中，最早指出了：「變更匯率的實際效用，稍縱即逝；似不必冒變動過劇的風險，來製造一未必能利用的機會」。所謂「實際效用」，即指各色策論

黎少峯

中所提出之改變匯率的好處而言；其實，不管是提出什麼辦法來，在開始總是說得天花亂墜，其所以利未見而害先視者，都因為其未必能利用那一個用犧牲一部份利益所換取的機會而已！

其後不僅每一次匯率之變更，招致了物價的劇動，甚至還有兩次只是匯率的謠傳，都掀起了很大的漲風；從此也就再很少有人談變更匯率的問題了。

現在不知怎樣又回到充分就業的煎藥上來？看一看，報上大登着招收失業青年的廣告，和失業自殺的新聞，多少機器在發鏽，多少游資在到處泛濫，那裏有一點充分就業的景象。如果說這一種說法，是為促使工貸緊縮，為平衡國家預算着想；則再省也不該省到工貸的頭上。就說工貸有流入游資的情形，多少總有些是投放在工業生產上面，比作其他毫無代價的消費要強一點。

由於這些情形之存在，所以筆者才同情李燾廉先生的弊訴。怪寫文章的人獻策不當，本來是豈有此理，好像是不敢向官家問訊，只有文人好欺；然而，以策論的作風來談經濟，便是自惹駝背軍師的煩惱，為健全言論及尊重學術思想的自由起見，豈僅應予以弊訴，即予以無情的駁斥，亦屬理所當然。如其為先承意旨，故作違心之論，自為士林之所不齒，其或偶有見木不見林之處，以至有捨本求末之建議，實出於善意的動機；

則論春秋大義，亦應責備賢者。

二、是策論不是論文

是學術便應該自成一派之言，有一個完整的體系；從理論到實踐，這其間也非生吞活剝之所能為功。即以充分就業而論，在美國製成法案之後，從羅斯福到杜魯門，始終未能在議會中順利地通過；有部份共和黨人，且指摘其為模仿蘇聯的辦法。如果說我國現在已臨到充分就業的階段，豈不等於是說我們已經和蘇聯差不多，而為美國新政人物的想望之所不及。

社會生產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人們的享受也不斷的增進，把充分就業解釋為生產發展的飽和點，那只是消極的解釋，或經濟病象的暴露。充分就業的積極意義，應是「各得其所」；具體的解釋，即如 國父所說之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貨暢其流。也就是說，首先是從人，其次是從其他物質資源等着眼，視其是否能各展其所長，各得其所用。假如不是以人為本位，徒予以表象的把握，一定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譬如一個吃飽了的人，端起一碗飯吃不下去，與一個病人，端起一碗飯之吃不下去，表象儘管相似，實際上卻大相懸殊，一個是生理的常態，一個是生理的病態。到今天還要說我國已經有充分就業的現象，那也只能是病態而不是常態。

是病態便應該設法求其改善，不能讓他原封

不動；作為一個理論來處理他，即須追尋其癥結之所在，以求得治本之方。通貨膨脹，本來也是一種經濟的病態；與這一病態的充分就業，恰有着交累交迫之勢，用通貨膨脹來挽救這一類所謂的充分就業，自然是病上加病。但通貨膨脹既非為工貸而來，工貸所加於通貨膨脹之影響，亦微乎其微。反而工貸因通貨之膨脹，其需要更為迫切。且吾人亦決不能囫圇吞棗，一口咬定說工貸連一點實際效用都沒有，寧願坐視一些無法週轉的生產事業之坐以待斃。如果說放出工貸，並不能增加生產，那只是通貨膨脹的罪過，並不是工貸的罪過。

從充分就業牽扯到工貸問題，也就是從經濟情況的研究，局縮到一個財政運用的範圍；再把工貸和通貨膨脹之關係，倒因為果，混為一談，並以部分代表全體，將所有一切通貨膨脹的罪過，都加在工貸上面；更屬不合邏輯。這是策論，這決不是經濟論文，不管他採取何等學院的形式，搬弄多少艱深的術語；終無以異於一篇請求停止工貸的呈文。其效用將見於工貸縱然停止，通貨仍然膨脹，而其所硬指為充分就業之病象，更日益變本加厲。

三、沒有結論的命題

一個本身不合理的命題，永遠不會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仍以充分就業為例，那一種時下的

說法，可以作成這樣一個命題：「在充分就業與通貨膨脹同時並存的情形之下，舉辦公債能否增加生產論」因爲舉辦公債的主要作用，恐怕只在於維持現有的生產，延緩其搖搖欲墜之慢性病狀而已！肯定的答覆既不易有；否定的答覆，就等於是主張取消公債，使生產更趨減退；又恰爲公債可以增加生產之反證。命題之如是提法，根本便無法答覆。

同樣，提出這樣一個題目：「論變更外匯匯率與否之得失」，也是得不到定論的，因爲問題的中心癥結，不在外匯本身。在論到得失之先，必須假設出種種的情況，左一個「如果」，右一個「假設」；這「如果」「假設」要始終只是些「如果」「假設」，那所論到的一切得失，便都等於是滿紙廢話。就是我們隨手找出一兩篇主張改發新幣的策論來看，也可以看出那一些肯定的論證，大多是出於極理想的假設；那一些「假設」一天沒有實踐的可能；所有一些肯定的論證，也還是無所依據。

所以要提出一個命題來加以研究，首先要看這一個命題是否可能得出結論。純學術的研究，有許多既存的學說作參考，比較還容易一點；一牽涉到現實問題，便不可馬虎。如目前我國經濟的主要病根，要不外戰爭之影響與通貨之膨脹；在這兩個根本原因還沒有解決以前，單談其他枝

節的問題和辦法，當然是難以說出一個結果。

要談這些枝節問題，說是也好，說否也好，都有道理；那看作者是採取一個怎樣的觀點。不過，如果從民生的觀點出發，恐怕這些枝節問題的辦法，實行起來，每每是害浮於利；過去拋售黃金與改變匯率的影響，卽爲一例。這並非是單就這一辦法的本身而論，有什麼毛病；而是在大前提未解決以前，小辦法不能起什麼決定的作用；既然不能獲得改絃更張的利益，便不得不忍受改革中的犧牲，而顯現出許多流弊。

在主張這些小辦法的人，每每看落了那應該顧慮的一面，把這幾年來作各種主張的策論與其在實現中的效果來對照一下，卽作者本身，亦當有所憬悟。

四、經不起考驗

在寫策論的人，又何嘗希望他那所揭曉的意見，竟獲得一個不良的結果；在起初還不是出於一腔熱情。卽就充分就業這一個問題來說，談這一個問題的人，大多側重於指出通貨膨脹的危機；說用通貨膨脹來舉行工資之不當，並不等於說通貨膨脹可以保留，獨工資不應舉辦。但既然是提出建議，帶有策論的性質，那便可能被採擇施行；就理財者的眼先看來，停止通貨膨脹難，停止工資易，且可節省一部份的開支，在採擇之下

，焉得而不先考慮的停止。

還有些文章，大體上是一些理論的批判，只因在涉及現實問題的時候，不得不提出一點具體的意見。這些意見，與其所闡述的理論，原有其不可分解的關係，毋視於其全般的理論，單只把一兩點意見抽繹出來，付諸實施；其因實施所遭致的後果，實非作者始願之所能及。

時常聽見有人說某一經濟論文，僅有消極的批評，沒有提出具體的辦法；這一種看法，只可以拿來對策論，至於有學術價值的論文，根本使用不着要提具體的辦法。何況偶爾談到一點辦法，還有上述這一些流弊。

學術論文，有永久價值，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策論則如其所主張者行之失效，連自己再看起來都感覺慚愧。學術論文是供學術研究的，其價值在真理；策論是對在位者獻策，其成敗利鈍，握於實行者之手，既沒有決定的關鍵，也就沒有固定的價值。學術論文中所提出的主張，不離於真理；有時雖不得在位者的採納，甚或有被鉗制之虞，然終有一日能爲大家之所公認；策論則處處爲在位者着想，自不得不有所牽就附合，而減低其學術上的價值。所以策論是經不起考驗的，特別是在經濟局勢頗難樂觀的時候，談經濟的最好莫寫策論。

十、十四日子燈下。

商代之國都問題

於務泰

史記殷本紀言商之先人「自契至湯八遷」。自湯至盤庚又遷過五次。湯以前之八遷，其地不盡可考。王國維荷集尚書正義，世本，荀子，左傳，今本竹書紀年諸書研究結果，以為此八遷是契由亳遷蕃（今陝西華縣附近，或在河北平山附近，若信商人是濱海民族，則後說自較可信），昭明遷砥石（今河北砥水流域），又遷於商，其子相土東遷於泰山下，山泰山下遷商邱（今河南濮陽縣），其後人（名皆不可考）自商邱遷於股，又自股遷商邱，至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共為八遷。（見氏著觀堂集林之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這也不過是一種推測而已，是否真是如此，當然還很成問題，王氏於相土之遷泰山下，再遷商邱，即頗置疑問。湯至盤庚之五遷，書序雖舉其四，但我們也不大弄得清楚這些地方，其所以弄不清楚，有兩個最大的原因：第一，是古代某地究應為今之某地，不大容易考得出來；第二，是「亳」的問題。至今未得一確定的解釋。據王國維說，古時地以亳名者凡八九。那末，帝嚳居亳與孟子所言「湯居亳」之亳是一地，抑為二地，其地在何處便不得而知。我們今日所隱約知道湯以後盤庚以前商代的都城，只是湯居亳，湯都亳，中丁遷於囂（書序作囂，在河南滎澤縣，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河亶甲居相（今河南內黃縣，亦見括地志），祖乙遷於邢（書序作耿，史記正義引皇甫謚，謂為河東皮氏縣，的耿鄉，在今山西河津縣，通典謂在邢州，則其地應在今河北邢臺縣），盤庚都股（今河南安陽縣。王國維引東晉說以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股」之「亳」字為宅字之誤。史記殷本紀蒙其誤，以為股與亳為一地，故妄指其地在河之南。）這些些片斷的記載而已。盤庚遷後，在殷期紀中尚屢見遷徙，但張守節正義引真本竹書紀年云：「自盤庚以股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遷都。」就安陽發見之甲骨文來說，盤庚以後諸帝之名，已盡見於甲骨，僅末二世，帝乙與受辛未見，至少我們可

以說從盤庚到大丁之間十主是不曾遷過都的。則是正義之說可，其性是極大的。

商代都城，何以不憚煩勞，屢經遷徙，其中當然有其原因之所在，不過時間隔得太久，真的原因不能完全知道；其每次遷都的原因是否相同，自然更無從曉得。但靠着古書之記載和出土甲骨文的幫助，我們仍然能指出些大概原因。

一、水災 商代都城老是在黃河中游以下的兩岸搬來搬去，黃河善決，這是中國婦孺皆知之事，而古代河工不及今日之進步，亦所當然，所以由於黃河的潰決，使得商人不能不遷都，是情理中可能的事。故尚書正義卷八「鄭玄云：『祖丙又去相居耿，而囂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又卷九「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修路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舊都。』」

二、牧畜 商代是畜牧與農業並行時期，有時為了他們牲畜的芻秣，使得他們不能不遷都，這在畜牧社會中是很普遍的事。至於商人還在盛行畜牧的證據，舉起來是多得很的。吳其昌先生根據鐵雲藏龜，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後篇，殷虛書契續編，龜甲獸骨文字，燕大殷契卜辭……七部大書，統計出來，共見「田」字四七三次，而確實可以解作田地意義的，只不過五次而已。餘下的是狃獵的意義，是動詞，非名詞。並且我們看卜辭中，商人每次祭祀，屠宰牛羊的數量，浪費得教人駭然；一次宰食三百條牛，因當時是稀鬆平常的，不算什麼一回事，可見在商代畜牧還很盛行。

三、幼稚農業 商人雖然還在盛行畜牧，而農業卻也在逐漸長才。卜辭中談到黍禾的記載，多至不能勝舉，此外他們還知道種麥種粟。在古書中，也有不少關於商代農業的記載：如孟子云：「湯使亳衆，往為之耕。」商

書盤庚上篇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作。」又云：「情器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商頌烈祖篇云：「豐年穰穰。」皆其例也。但商代之農業，決未入農業鼎盛時期，這不但可以由商代之盛行畜牧情形可以說明，即根據商人文字與所用之農具，亦能加以證實。卜辭之「農」字（鐵雲藏龜八七葉），或「𠄎」（殷書書契卷一之三三葉）下从火，象苗，說文以焚為燒田，商人很可能就是用這種簡陋辦法耕種的。又卜辭中之「農」字作「𠄎」從「林」從「辰」。「林」是植樹成列的表徵，「辰」乃耕器。「𠄎」即是石字（見郭沫若著甲骨武釋之釋支干稿辰字下）。這就是說商代農具是石製的，以石為農具之商人農業，當然不是頂發達的，初期農業的人們，不懂得怎樣施肥，依農業之生產方法來說，還是屬於最初期的生產狀態。所謂順天稼穡時期(Natural husbandry)是也。在此時期，耕夫除播種收穫外，所做之工作極少。被等安於稀少之收穫，假於其所得過少，則耕夫另擇新地。其生產額之多寡，一任自然界之決定。關於這件事，從古籍中還能找得旁證出來，周官大司徒載：「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所

謂不易之地，就是每歲都可耕種的田；一易之地，就是須休息一歲可耕的田，再易之地，就是休息兩歲可耕的田。周官一書之真偽固不可知，康有為雖然肯定說是漢劉歆所偽造，其偽亦遠在漢代，漢代的人去古未遠，倘假想在周初農業生產方法，不遠是屬於休息地方時期(Zarad-Pallow Stage)，僅較順天稼穡時期為晚。則我們假定周代前一朝代之商大部是採用順天稼穡的農業方法，不算是相差太遠吧；從已發現之甲骨文來說，有「癸卯貞，東受禾。北方受禾。西方受禾。」的記載（見殷虛書契續編）二、二九·二〇。或許就是他們想問那一方適宜於他們去種禾吧。商代農業大部是屬於順天稼穡時期，所以某處的收成過少，就逼得他不得不遷都了。

以上所列舉之三個原因，有時單獨一項就能構成一次遷都的原因；有時畜牧與農業合起來才構成一次遷都的原因，當然其中有一個是主因，有一個是副因。這裏我想引盤庚中篇的兩句話來，概括商代遷都的原因，這兩句話是：「先生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只是這個「利」字到底如何解釋，則頗費疑猜耳。

本刊啓事

- 一、本刊因印刷成本過於提高，每冊改售五千元。
- 二、關於訂閱辦法，原因物價時常波動，不能作硬性的規定，過去是採用預收刊費活動計算方法；近來許多讀者要求改作硬性規定，訂費標準於下：
 - (一)訂出半年(六期)！平寄三萬元、掛號或航平三萬五千元、航掛四萬元、
 - (二)訂出全年(十二期)！平寄六萬元、掛號或航平七萬元、航掛八萬元、
- 三、原訂戶請即查對訂費收據，如前所繳刊費收據(即按照每期售價八折計算扣付)或已完，而願續訂者，請改照前項辦法規定，速即匯足訂費，指定寄法，以免周折。

本刊發行所敬告 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湘芬書局

本局三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奉 湖南省教育廳未鳳三字第一三零九七號通知轉奉 教育部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國字第四六四三八號指令特准印行國定本中小學教科用書其售價悉依 部令之規定

供應大批 白報紙 印刷精良

國定小學校課本，
各科參考圖書；

統辦一切：文具，儀器，體育用品。
發行 定期刊物，經售 中西雜誌。

學校採用 同業批售 特別優待
外埠函購 售價克己 負責運送
目錄備索 如蒙惠顧 無任歡迎

湖北區 漢口交通路
武昌中正路

湖北論壇約稿簡則

- 一、本刊為社會性刊物，言責作者自負。
- 二、本刊之宗旨在於研討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之理論與實際問題，謀健全輿論之發展，藉以促進地方自治及民主制度之建立。凡適合此旨趣之文稿均所歡迎。
- 三、本刊歡迎下列三類文稿：
 1. 研討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理論與實際的論文。
 2. 敘述本省各地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實況的通訊。
 3. 短篇文藝作品。
- 四、論文每篇以四千字為原則，通訊與文藝作品每篇以二千字為原則。
- 五、來稿文體以語體文為原則，淺近文言亦間採用。
- 六、文稿須用有格稿紙，抄寫清楚，標點亦佔一格。
- 七、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事先聲明。
- 八、各類來稿均須作者署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否則不便登載。
- 九、來稿登載後其版權仍為作者所有，但如本刊蒙印叢刊時，得自由編纂。
- 十、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酌致稿費二萬至三萬元。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鄂字第一二〇號
 湖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三八號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湖北論壇

第二卷 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劉叔模

主編人 湖北論壇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及定購處 漢口湘芬書局
 (漢口交通路廿六號)

印刷所 湖北民生印刷公司
 (漢口生成南里十二號)

特約經理處

分銷處

上海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南京 大新書局
 南昌 東方書局
 廣州 上海書局
 沙市 啓文書局
 宜昌 藝文書局
 萬縣 藝文書局
 恩施 商務印書館分銷處
 老河口 友書局
 香港 上海書局
 武漢及各地大書店

本期售價五千元